

那年，一次有关公费宴请的报告

□ 启明

最近受邀参与编撰一部有关文史记忆方面的书，便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各类地方史料中旁搜博采，即使是那些属于偏记杂谈一类，也两眼放光，多有顾及。大海捞针般，一番寻章摘句，竟屡有意外之喜。譬如下述的这一史料，与当下正提倡的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就大可对应。

平湖解放前夕，浙江萧山人楼正华于1948年6月7日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命为平湖县长。而分别从上海、杭州受派遣来到平湖开展策反工作的几位地下党员在与楼正华接触后，都在向上级汇报时提到“楼正华思想比较进步，愿意跟共产党走”。事实上，到平湖任职后，楼正华确是冒着极大风险，为储粮保军、扩建和控制地方武装、准备起义等做了不少工作。1949年5月11日傍晚，解放军开进平湖县城，宣告平湖解放。解放后迅

即开始的平湖国民党政权的接管工作，由于楼正华的积极配合，也开展顺利。

同年6月初，楼正华行将离开平湖，赴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科科长。为表示感谢，中共平湖县委第一书记戴奎和班子其他成员都觉得应为其饯行。但就是这样的一次宴请，却使戴奎颇为犯难，因不知如何是好，急得他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东请示，西报告，因为这是平湖解放后的第一次公费宴请。平湖市档案馆保存着一封1949年6月1日由县委书记戴奎、副书记秦泽甫署名的写给中共浙江省第一地方委员会领导的信，内中有这样的字句——

……现在接管工作大体就绪，他（楼正华）准备回杭。所以我们才这样计划，事先在电话上请示，因路途较远，讲话不通，故我们决定先花一部分钱请他一下，但这个钱的数目现在很难规定。因为一

二日内即请他，现在还没有标准，我们只好尽量减少开支，避免铺张。

最后所谓的宴请，也就只是在县政府的机关食堂炒了几个菜，几杯薄酒，以示欢聚与饯行。参加人员为当时县委的4位领导，书记戴奎，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秦泽甫，县长方建烈，宣传部长齐克飞。

似乎还是在前不久，社会上那些为讲排场比阔气而水陆杂陈、珍饈罗列的奢靡场合，以及，工作中自行其是甚至胆大妄为的诸种现象，毋庸讳言，是仍时有所见，常有所闻。而上述史料尤其是那封向上级报告的信中所体现的审慎、严谨与节俭，遥想那个年代，再比照当下，是颇使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而后又击节赞叹的。许多史料虽随时间的漫漶而渐趋幽微，但其内蕴的宝石般的质地，足可烛照久远，昭示深长。

上学的箱子

□ 张勇

又是一年开学季，每每这个时候，就想起当年自己考大学和离家上学的情景，想起父母为我准备上学用品的情景，想起那只简易的木箱子。

那年父亲在镇医院上班，母亲给食品公司装鸡蛋，就是将食品公司收购的鸡蛋装箱，然后运送到省城。这样的活我也能干，于是跟随母亲去食品公司。先给木箱铺一层麦糠，然后放一层鸡蛋，鸡蛋和鸡蛋不能相挨，一箱鸡蛋要装几层，装完之后便有人封箱，那时是计件付酬。我们兄弟四个，父母负担挺重，仅凭父亲一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实在艰难，所以，母亲就一直打零工。刚好放假，我也跟着母亲打短工。

当时公司的领导问及我的考试与升学，母亲高兴地说了我考学的情况，又顺便问能否买一只鸡蛋装载木箱给我用。领导爽快地答应了，我和母亲十分高兴。箱子是木板钉的，毛边，有缝隙，上面一块木板盖着。箱子带回家，我就去街上买了合页和铁门安装在上面，再用白纸糊了里面，这便成了我上学的箱子。父亲说，他会在我入学之后抽空找顺车给我捎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罩。母亲将被褥拆洗干净之后，再缝上被挡头，保护被子顶端不脏。如果脏了，拆掉那块挡布，洗净再缝上，方便。母亲又给我扯了布料，将毛毯包住，像缝被子一样缝好。我帮着母亲，母亲不时指点我，说以后自己要学会这些普通的针线活，拆洗都要自己去做。

那个箱子很快就被这些东西装满了，急用的我自己先带走。九月不冷，薄被褥和衣物捆在一起，其他的都装进了箱子。我高兴地抱了抱箱子，冲着箱子笑着说：“我坐班车，箱子你坐顺车直达，我在学校等你。”说得父母都笑了。

我联系了一起去学校的6名同学，这样，父母也都放心了。捆扎好被褥，最外面是塑料纸包裹着，我们像解放军那样背起背包，手上还提着包。一位年龄最大的同学带领我们，到市汽车站后，他先给我们登记了住处，然后我们就各自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又是他叫醒我们，让我们赶快准备上车。这天晚上，同行的同学问及我的行李怎么那么少，我说还有一只箱子，不久就会捎来，有同学便表示也让父亲捎带，我高兴地答应了，说到学校再给父亲写信联系。那个时候根本没带手机，只能书信联系。

下了车，师范学校的一辆大卡车专门迎接我们，就顺利地到了学校。这所师范学校和当时的高中条件差不多。宿舍是原来的大教室改的，我们睡通铺，一张床板换一张床板，中间放着一排课桌。近处的同学有的带来了箱子，就放在自己的床板下面。入学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父母乘坐给省城送鸡蛋的车来到我们学校，一同捎来的还有同学的箱子。打开箱子，我看到了母亲给我做的千层底布鞋、粗布床单等衣物。之后，我找来几块砖，将放在床下的箱子支起，这样箱子就不会受潮。我还将自己的饭票、零花钱等东西放进箱子……

那个时候，校门口的收发室窗台上每天都会摆放许多来信，那可是我们每日下课后要围观的地方。能收到家里的来信，别提有多高兴了，家里的来信我也都放进那只箱子，想家的时候，掏出钥匙，打开箱子，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悄悄看父母的来信……

那时每月21.5元的伙食费，国家供给，学校给我们办成了饭票，女生吃不完，我们男生基本够吃。饭票就锁在那只箱子里，少量装在口袋里。一般情况下不让家里再寄钱。那时候周六也上课，只周日休息，这个时候打开箱子，取点零用钱逛逛街。回来之后，常会打开箱子，取出家信，给父母写信，告诉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一学期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回家时，学校就将假期的伙食发成现钱。一个假期的伙食，足够我们去买车票回家，剩余的钱我们还能给父母买些食品和特产。

一晃40年过去了，每每提起那些事，孩子们总是说又翻老黄历了。是啊，如今日子好多了，有各式各样的拉杆箱子，自然也有被罩，更有时尚的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上学也可以坐自家的车，或者飞机高铁……可是，那些曾经的岁月和往事以及那只木板箱子，总是挥之不去，在我的心里常常荡漾出波澜……

光阴里的禅

□ 陆锋

夏花开到凋零，秋意悄然而至。

年岁渐长，心便越发沉静，越发眷恋着光阴缝隙中的琐碎平常。我太笨拙，留不住春日的姹紫嫣红，只得在深夜从园子里偷走了最俏的那朵花，悄悄放入时光的花瓶里，妄想昧下几分春色。却不知，花开过了，春色就走了。

我只能等、只能等，等清风明月，等荷叶田田，等十里荷香。清风中优雅垂柳是我的笔，月光下闪亮亮的池水是我的墨，一笔一笔写下相思。相思十八笔，这一笔是内敛，那一笔是深沉，横是陪伴，竖是包容，撇是付出，捺是理解。我在藕花深处，用心中的芬芳写下了一朵俗世的花。

曲径阶绿，山水一般闲。我在光阴流淌中低眉浅笑，颇有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简单傻气。曾经年少时的浮躁，早已千山万水。此刻，岁月，静好。

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我心中没有岸，只有一扇窗，打开是尘世烟火，关上是水云禅心。

光阴漫过秋日，禅是一朵花，开在流年中。我守着这朵花，等那繁华深处的暗香浮动，那是我写给光阴最美的诗行。

我曾越过沧海桑田，走过坎坷泥泞，最后于清浅岁月的罅隙聆听光阴的低吟浅唱——是空山中欢快的鸟语，是海浪撞击岩石、是明月下的琴瑟和鸣……

光阴如水，晴耕雨读，观鸟听鱼，任窗外花开花落，我自心中修篱种菊。

一腔热血为山河

□ 廖华玲



电影《八百》剧照

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军队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会战，如淞沪战役、晋北忻口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曾围堵红军的四川军阀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刘湘在病逝前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吃不饱，穿不暖，寒冬里只有单衣单裤的川军壮士，从将军到士兵都义无反顾，奋勇杀鬼子，于是有人称川军“内战外行，外战内行”。蜀中儿女多英烈，王铭章将军牺牲了，“誓与滕县共存亡”；饶国华将军殉国了，“胜则生，败必死，不成功便成仁”；李家钰将军阵亡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杨靖宇将军曾对一位劝他投降的村民说：“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从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抗战注定就是一场全民的抗战。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东北抗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在华南沿海地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华南游击队把抗战从农村推进到城市甚至敌占区的香港；在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人民勒紧裤带，捐款捐粮，提供了国民政府战时的绝大部分物资；在南泥湾，根据地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海外，华侨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国内的抗战，南洋华侨机工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崎岖的真腊公路上运输了大量抗战物资。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主席写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抗战，全民族的抗战，保家国，万众一心，坚硬如铁。一腔热血为山河，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老刘”老师

□ 夏春燕

九月，又一次的辞旧迎新，我迎来了教学生涯中第一届的六年级学生。欢乐、无忧、自由、阳光……这样的字眼在脑海深处不由得欢腾而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欢喜的年级。

记忆不由自主地被拉回自己的六年级。那是2000年，那个世纪千年伊始的年份，空气里弥漫着勃勃的生机。如今回想起来，我总想起学校操场四周那几株枝叶浓密的梧桐，阔大、油亮的叶子挨挨挤挤，但从门间又总能投射下细碎而又斑驳的日光。还有学校后门口河对岸的那一株合欢，枝干虽已显佝偻，可疏影横斜，仍是永不知疲倦地临水照花……

记忆总是无法绕开那位老人。他是我们六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姓刘，大家都叫他“老刘”。后来，为了表示尊敬，又在后面加了“老师”两个字。“老刘老师”就这样叫开了。他的确很老了，已经退休的年纪，又被学校返聘回来教我们。“老刘”有严重的气喘，说话的时候，伴随着气喘的呼呼声，喉咙还会发出一种轻微而又尽量抑制的“嘶啦嘶啦”的声响。

我记得六年级的第一天，教室里议论纷纷：“据说，这学期的数学老师很严的！”“是啊是啊，听说很多学生都被他骂哭的！”“就是那个很凶的小刘他老爹！”……我们面面相觑，对于这个新学期的数学老师，心里陡然产生一种不可名状地畏惧和排斥。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刘”确实是一个很严的老师，一个严谨的老师。他虽然老了，但是对于教学，似乎有

使不完的劲。他的数学课，永远都是神采奕奕，激情澎湃。一个周末，“老刘”布置了一道“路程问题”，告诉我们这是一道很难的题目，可以尝试着做一做。我真冥思苦想也做不出来，但那时自己骨头越硬越要啃的劲，几乎整个双休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有了思路——我做出来了！到了周一，班里其他人果然都没有做出来。“老刘”叫我上黑板去讲思路。我讲完以后，他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他却又若有所思。只见他对着黑板久久地比划着，一会儿用粉笔在座标轴上点一下，一会儿嘴巴里念念有词，好一阵，他才微笑着转过头来告诉我：“答案是正确的，你的思路我也理解了，但还有更简便的解答方法！”只此一句，尤其是前半句，是对我一个周末绞尽脑汁的最好肯定，让我以后每当在数学上遇到难题，坚持不轻言放弃。

“老刘”对于教学是严谨的，而对待教育更是格外严厉。那个时候，我是班里所谓的“好学生”，但由于自己不错的学习成绩，滋养了班上的一股戾气，对待同学并不友好。有一次，我在班里搞“帮派”被一个同学给“告发”了。“老刘”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我自知理亏，吓得大气不敢出，心想：这次要吃批评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厉声呵斥，而是为我分析利弊。那一天，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大致就是“做人要谦逊及虚怀若谷”之类吧，只有他那一脸的慈祥以及充满希冀的眼光一直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现在想来，真的全心感激，以我那个年龄的骄

纵、敏感，要是在全班面前被劈头盖脸地狠批一顿，该会留下一道怎样不堪回首的阴影。

还有一次，班里几个男同学迷恋上了打乒乓，一边打还赌输赢，而输赢的筹码竟然是班里几个长得漂亮的女同学！这件事，弄得女同学们很羞涩，但抗议又无效，真是哭笑不得。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传到了“老刘”的耳朵里。很清楚地记得，从来都是一脸言笑的“老刘”，那一天在全班面前狠狠地拍了桌子，那响彻教室的声音让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从此以后，此类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童年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的；童年的记忆，总是清新而别致的。即使期末应该阴霾笼罩，大雨滂沱，而如今回忆得起的，永远都是阳光照射下的油亮的树叶，望不到边的澄澈湛蓝的天空。很快，我们毕业了。

我们毕业后，“老刘”也终于“退休”了。真正退休后的“老刘”喜欢坐在名唤油车头的那间矮矮的小茶馆里喝茶、看牌。茶馆在河的西岸，河上架着一座桥，是我们去新仓上学的必经之路。每次我放学回家骑车经过，只要一回头，总能看到“老刘”乐呵呵地坐在茶馆的门口。我灿然一笑，再喊一声：“刘老师！”他就朝我挥一挥手，发出“呵呵”的笑声……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总觉得他面容和蔼，笑声可亲。初中时的学习，比小学紧张了不少，刚开始我一下子无法适应，成绩一落千丈，但是每天只要看到那个端坐的笑容满面的身影，仿佛所有委屈都变得温暖了起来。

三年后，我去了平湖读书。那座桥也因为年久失修而被拆除，那条路就成了一条断头路。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走过那条路，再也没有再见过“老刘”。脑海里却时不时地会惦念：那个身影还这样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吗？他不会因为再也望不见他的那些学生的背影而备感落寞……前不久回家，碰到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跟她聊起：“不知道老刘老师现在怎么样了？”“你不知道吗？老刘已去世了，听说他最后喘得越来越厉害，一口痰塞在喉咙……”我怔住了，呆了好一阵，心里暗觉歉疚：这些年，我应该去看看他的，而他最想听的，肯定是我和我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隔着悠悠的岁月，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老刘”手舞足蹈地讲课的样子，其间透着艰难的喘息声、微微轻咳声和那个陪伴了我整个初中岁月的小茶馆门口的落寞身影，以及那段如阳光般清亮明丽的六年级岁月。

二十年后，我迎向教学生涯中的第一批六年级学生，对着他们欢腾、雀跃的身影，在心里低低地道一声：六年级，你好！

“老刘”老师，好久不见……



市博物馆馆藏作品选